

陈嘉庚的民族复兴意识及实践路径转变

——以党百年奋斗主题为视角

肖仕平^{1,2,3}, 周煜¹

(1. 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2. 陈嘉庚与爱国主义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21; 3. 集美大学陈嘉庚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陈嘉庚憧憬民族复兴, 抗战前, 他主张以教育提升民族素质; 以实业发展国家实力; 以改革促进社会进步; 以文化确保民族精神, 通过四者, 最终臻至民族复兴大业。陈嘉庚依此艰难实践, 但最终体会到独靠一己之力无以成效,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更致其复兴梦想破灭。至此, 陈嘉庚领悟到民族复兴当有两大前提: 抗日救亡, 政治清明。1921年以来, 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1940年的延安之行让陈嘉庚看到解决两大前提的坚实力量。由此,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复兴实践形成对陈嘉庚先生强烈的思想感召及其坚定的行动汇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陈嘉庚开始了民族复兴的新实践。陈嘉庚民族复兴的实践路径转变在当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民族复兴; 陈嘉庚; 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 D 613; K 8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2) 05-0033-09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一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 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 习近平总书记同时又说: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 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1] 陈嘉庚作为海外华侨的杰出代表, 痛彻思考民族复兴问题, 并为此进行实践探索。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的回信中就指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也是陈嘉庚先生等前辈先人的毕生追求。”^[2] 毫无疑问, 陈嘉庚是鸦片战争以来期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仁人志士的典型代表。探讨陈嘉庚民族复兴意识和实践路径的转变, 对我们进一步深化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主题有启发意义。

一、抗战前陈嘉庚民族复兴意识及其实践探索

陈嘉庚生于1874年, 他的思想形成时期正处在国家饱受欺辱和磨难的历史年代。幼年时期陈嘉庚在家乡读私塾9年, 私塾读物中蕴含的家国观念留给他深深烙印; 成人后在东南亚的生活经历又使他目睹殖民地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统治下的工商业繁荣面貌。1923年陈嘉庚任怡和轩总理后, “挚友孙崇瑜偶亦翻译中国政治之英文书刊, 口授之以陈氏, 以供陈氏参考。陈氏不仅对中国政治感兴趣, 对一般的西洋文化亦然”^[3]。处于这一内外背景下, 中外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对比, 更让陈嘉庚深怀民族复兴志向, 并立志为之践行, 他自信“诚能抱定宗旨, 毅力进行, ……以四万万人之民族, 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 尚有来日, 及身不达, 尚有子孙, 如精卫之填海, 愚公之移山, 终有贯

[收稿日期] 2021-10-17

[基金项目] 厦门市集美区社会科学调研课题(集社科研[2021]20号)

[作者简介] 肖仕平(1965—), 男, 福建南平人,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嘉庚精神研究。

彻目的之一日”^{[4]449}。他坚信,四亿中华同胞目标专注,齐心协力,一同奋斗,民族复兴终会有时!在抗战前,陈嘉庚对民族复兴积极思考及实践探索可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 以实业发展国家实力

鸦片战争以后,一方面,清政府昧于国际大势,无以正确认识及有效应对世界;另一方面,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种种特权,严重侵害了中国主权,国家日益陷于贫穷衰弱。面对此种状况,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催生了许多实业救国论者,他们反思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将优胜劣汰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归结为经济的竞争。当时就有论者指出:“今之论者,莫不曰中国亡于外交失策,亡于武备不修。夫岂知商务弗兴,漏卮不塞,实足亡中国而有余也”^[5],把国家的败落,归于经济落后、工商实业不发达。他们认为,只有振兴实业,才能救亡与复兴。《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断言:“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培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一日不辍。”^{[6]131}为此他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6]129},认为只有振兴商务,才能收回利权,国家富强。“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宜设专厂制造机器”^{[6]129}。处于当时所处时代,陈嘉庚也有这样的看法,积极发展实业。

1904年,陈嘉庚自营创业,先后开设黄梨罐头厂、米店,种植黄梨和橡胶,经营熟米厂等。1905年,新加坡华侨社会发起停买美货运动和追悼反美烈士冯夏威的集会,陈嘉庚参与了该次活动。通过这些活动,陈嘉庚对国家兴衰与个人荣辱之间的关联以及实业和国家富强之间的联系有更清楚的认识。1910年,陈嘉庚参加同盟会,这一年,他商业上也大有斩获,积资近百万。在后来的访谈中,陈嘉庚坦诚当时自己“振兴工商业的主要目的在报国”^[7]。对于何以发展工商业能够增进国家实力,促进国家富强,陈嘉庚在1923年的《南洋商报》开业宣言中有所阐述,他说:“夫文明国之所谓商者,既能经营天产之原料,兴厂制成器物,复益以航业之交通,银行之便利,保险之信用,发行机关之完备,凡诸商业上种种之原理,又莫不洞若观火,

而具有世界之眼光,故其物品优良,大促销社会之需要,博国际之欢迎始是以居商战之地位,执其牛耳矣。其经济上势力与精神,尤能辅助国家……”^{[8]17}也就是说,工商业发达,国家能够开采原料,兴办工厂,制成产品,再发展航运交通、银行、保险等,从而促进社会需要,使社会充分发育成熟,通过在上世界赢得商战中的一席之地,博得国际的认可和欢迎。

在行动上,1911年陈嘉庚筹款资助福建革命军政府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陈嘉庚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跃上了实业报国的新高度。1912年,孙中山开始推行实业建国方略,提出发展实业、振兴中华的具体方案。陈嘉庚则“尽国民一份子职责,拟在集美社创办制蚝厂以及集美小学校”^{[9]420},他原本已经在新加坡筹备设备,从日本聘请了技师,但因集美本地的海蚝生长期短,不耐高温,加上技师缺乏经验,试制仅十余天,即告失败。陈嘉庚曾在南洋经营米业、罐头业,种植橡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商船运输困难,他又敏锐投资运输业等。虽然他侨居南洋,但他感觉在南洋经营实业也是建设中国的重要一环,“南洋实业,日益发达,……则中国欲发达实业,南洋实为重要之地”^{[4]181-182}。基于这种认识,陈嘉庚实业的主营产品与祖国的建设相连,他特别将公司的胶品制造业务同国家振兴、祖国富强并联考虑,他说:“橡皮熟品制造厂之创办,我亦为一种理想之提倡。二十世纪称为橡皮之时代。欧美之盛,固不待言,岛国日本亦已设厂至数百家,独我国则尚未萌芽。新加坡为橡皮出产地,且距离我国不远,男女侨胞数十万人,若能设备大规模制造厂,不特可以利益侨众,尤可以为祖国未来工业之引导。”^{[8]17}陈嘉庚的这段话意涵深厚,他期待以他的橡胶产业训练技师,使技师工人于他日返国时可以发展现代工业,增强国力。

(二) 以教育提升民族素质

对于教育在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中的重要作用,清末在知识分子中就形成广泛共识。郑观应提出教育救国,称:“学校,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中国亟宜参酌中、外成法,教育人材,文武并重。”^{[6]129}盛宣怀也说:“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

学堂为先。”^[10]公车上书时,康有为强调:“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11]在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前,青年毛泽东也曾撰文称:“窃我国今日要务,莫急于图强;而图强根本,莫要于教育。”^[12]清末民初,寄望于兴学办教,坚信教育救国是社会高度共识。

面对灾难深重的祖国,陈嘉庚痛心疾首,他说:“全世界各事业,最落后者,莫如我国,此事尽人都知。”^{[4]125}但他抱定中华民族不是劣等民族的信念,认定民族不兴、国势不张、国家积弱的原因在于当政者不重视教育,民智未开。陈嘉庚通过各国识字率数据醒目而强烈的对比,说明教育对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重要性,他说:“欧美先进各国,统计男女不识字者不及百分之六七,日本为新进之邦,亦不满百分之二十,我国则占百分之九十余。”^{[8]17}在调查全国教育状况的基础上,陈嘉庚还进一步指出:“江苏教育,可谓发达矣。然平均而论百人之中至多亦不过十数人受教育,即多至百分之二三十。若与欧美较,则仍远甚。”^{[8]183}陈嘉庚忧心教育,牵挂国家,1918年6月,他在《筹办南洋华侨中学演词》中痛陈:“我国政府既不注意教育,国民复自顾私利,视财如命,互相推倭,袖手旁观,以致教育不兴,实业不振,奄奄垂危,以迄于今日,此诚堪痛哭流涕者。”^{[8]31-32}

陈嘉庚认定“教育之盛衰与国家社会有密切关系”^{[4]176},20世纪20年代,他就指出:“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8]38}他认为,要改进社会,富强国家,最根本的办法是办好教育。办好教育,才能启迪和培养国民的智慧,使落后贫穷的国家走向先进和富强。在《致集美学校诸生书》中,他说:“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鄙人所以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撓吾念虑,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唯日孜孜无敢逸豫者,正为此耳。”^{[4]160}

1894年冬,陈嘉庚在家乡集美创办惕斋学塾,这是他办学之始。1913年,陈嘉庚创立集美小学。此后,他陆续又增办各种类型学校。到1927年,集美已有男小、女小、男师范、男中、

女中、水产航海、商业、农业、幼稚师范等十余所学校,还另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合称“集美学校”,成为规模宏大、体系完整的“学村”。此外,陈嘉庚还为福建省70多所中小学提供资金支持,为学校办学提供指导方案。陈嘉庚以一人之力,促进地方教育发展,但即便如此,陈嘉庚还是感叹国内基础教育不张,教育师资匮乏,20世纪10年代末,他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决心创办大学培养更多的师资,“私心默察,非速筹办大学高师实无救济之良法”^{[4]183},“夫教育之急切如彼,而师资之缺乏又如此,设政府欲实行兴学,不能不多设初级师范,以制造小学教师。而初级师范之教师亦必在千名以上,方敷分配。作十年计算,每年高等师范毕业生应有百名之外,寻源反本,则高等师范决不能不先为计及。吾闽高等师范设而旋废,留学他省或外国毕业者,又寥寥无几。师范教师之缺乏,无异于小学教师。……当轴者既不能为我谋,则吾民不可不早自为谋,兴学责任诿有旁贷。鄙人于是不揣冒昧,爰敢倡办高等师范”^{[4]170-171}。为了培养更高级的人才,他捐出几乎是他当时的全部资产——400万元创办厦门大学。厦门大学于1921年4月6日在集美学校开学,陈嘉庚独立维持厦门大学16年的费用,在此期间,即使生意遭遇重创,他仍不惜变卖家产,维持厦门大学运转。

(三) 以改革促进社会进步

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基本上是个自我封闭的体系,“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13]。早在嘉庆年间,龚自珍已经警觉注意到“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14]。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天朝上国”的迷思被打破,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倡导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做认真细致的了解,其后魏源系统提出“师夷长技”主张。龚、林、魏主张学习西方的新思想,开启了近代变革思想。随变革呼声迭起,又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等兴起。康有为在《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中说:“若当变不变,必有代变之者矣。与其人为变之,何如己自变之之为安适。”^{[15]256}20世纪以后,清末开始的社会变革思潮风起云涌,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潮,变革思想影响到

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促成更为深刻的一系列社会运动。清末民初,以变革救民族、以变革求复兴,成为时人流行的观念,陈嘉庚也不例外。

1937年,陈嘉庚借讨论中国的服制问题谈到改革,他说:“故吾人以为欲谋民族之复兴,一切改革必须力求其彻底。大而一国之政体,小而一身之衣服,举凡悖理之法,失时之制,皆宜以大刀阔斧,斫伐而铲翦之,务使全部皆呈新气象;然后‘复兴’二字,始有足言。”^{[8]67-68}这段话表明,在陈嘉庚看来,改革的范围是广泛的,从国家政体到日常的服饰都应改革的;改革的目的是明确的,改革的彻底性首先归因于改革的目的性。

陈嘉庚以改革为要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都积极推动改革。针对旧社会的种种陋习,他广开社会教育,大力倡导种种公序良俗,推动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法变革。如创办民众夜校,取缔烟赌恶习,禁绝游神烧纸钱,全面规划家乡房屋、道路、医院,改进龙舟运动,改造旧茅厕,编订医书《增广校正验方新编》,兴建图书馆、科学馆。在侨居地,他禁抽大烟,提倡公匙公筷,设立图书阅览,破除以籍贯地缘划分的学校、社团,成立中华总商会,促进华侨社会的移风易俗和长远发展。

(四) 以文化确保民族精神

鸦片战争爆发后,面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升级的挑战,中国社会内部的危机日渐加剧,关于文化的争论也开始兴起并渐渐白热化,鞭挞旧文化、讴歌新文化成了一股重要思潮,但这一时期也有观点主张应该挺立中国固有文化,从而实现救亡和复兴。如康有为说:“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亡莫大于国魂亡,而国亡次之。意大利不亡于奥乎?而国魂不亡,则今复立国而再强。”^{[16]797}他以意大利为例,说明坚守固有文化对于保国存种、民族复兴的决定作用。章太炎也要求“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17],要以固有国粹来激励和发动种性,增进人民爱国的自觉。当时的文化名人许守微说:“国粹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其为学,本之于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之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18]以国粹为国家精神的寄

托,称其为立国的根本源泉。

1935年,陶希圣、萨孟武等10位著名教授在上海《文化建设》月刊上署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随后又发表《我们的总答复》等文章,将文化之争推到新的高度,声言:“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一种民族自信力的表现,一种积极的创造,而反帝反封建也就是这种创造过程中的必然使命。”^[19]所以,要使中国在文化领域中抬头,就必须从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要“用文化的手段产生有光有热的中国,使中国在文化领域中能恢复过去的光荣,重新占着重要的位置,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劲最强的生力军”^[20]。这股文化思潮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强调要以中国传统文化来立国、救国,实现民族复兴。

陈嘉庚早年也关注文化讨论,他甚至还加入过康有为的孔教会。在陈嘉庚看来,文化的确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深层的强大力量,一个民族要求得复兴,必须要有民族文化作为根脉。1933年,陈嘉庚痛感“吾国国运危如累卵,存亡未可预卜”,为此他提出:“然吾民族赖以维系于不堕者,统一之文化耳。今日一人之文化,则他日可传千万人之文化。”^{[8]46}陈嘉庚以波兰亡国、复国为例,说明传统文化在民族复兴中的重要性:“昔波兰为强邻所灭而今日得以复国者,为能保存其民族之文化故也。”^{[8]46}“是故吾人,对于我国文化前途,应加注意,吾在事实上曾告诉吾人,如俄灭波兰,并亡其文字。当时波兰之人民,虽于强俄压迫之下,民间对于波国固有之文化,不忍放弃,多冒险私授波文,午夜深更,尚且父母教其子女,兄长教其弟妹,孜孜不倦。今波兰之复国,多有归功于其文化保存之力者,可见国虽亡,而固有文化尚未灭亡,终以文化之力量,而得恢复祖国也。”^{[8]63-64}同年,陈嘉庚在《星福建会馆举行改组四周周年纪念会上之演词》中又以《文化与国家关系》为题,谈到文化与民族复兴的关系。他以中国历史为例,称:“就以我中华民族而论,考诸历史,我汉族亡于元清之手,两度之恢复,亦全赖于文化之重力。”^{[8]63-64}因此,他提出:“世界任其如何变动,我国固有之文化精神,万不能残缺,此理甚明也。”^{[8]64}“将来世界如何变动,祖国当局,无论

走那条路,亦须保留我国文化,乃能维持民族精神,盖今日一人能保存文化,即他日千万人之文化,赖以保存,而传播于无穷也。”^{[8]65}

(五) 实业、教育、改革和文化四要素的相互关联及其在民族复兴中的地位

以实业发展国家实力,以教育提升民族素质,以改革促进社会进步,以文化确保民族精神,除此之外,陈嘉庚还进一步构思民族复兴进程中4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

实业发展国家实力,在陈嘉庚看来,它能积累起一个国家的财富,实业强则国家富,因此,它是国家国力的重要尺度,“人身之康健在精血,国家之富强在实业”^{[4]155},陈嘉庚将实业视为国家富强的核心。

实业固然具有核心地位,但陈嘉庚也特别重视教育在民族复兴中的重要作用。他强调,实业离不开教育。他说:“实业也,教育也,固大有互相消长之连带关系也明矣。”^{[8]44}固然,一方面,实业为教育注入财力,使教育有日益增加的经费支持,“教育之命脉系于经济。如经济处理得法,即易而解决也”^{[8]81};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教育为实业提供人才,则实业也无法取胜,陈嘉庚自言他兴学就是要为国家培养精通商业、建设实业的人才,他说:“我国商业之不振,推原其故,地非不大也,物非不博也,人非不敏也,资本非不雄且厚也。所独缺乏者,商人不知商业原理与常识耳。吾人深知此弊,以为补救之法,莫善于兴学。”^{[4]41}因此,通过对教育与实业关系的把握,陈嘉庚把教育视为国家富强的根本,提出“教育为立国之本”^{[4]144}。

在陈嘉庚看来,要确保实业和教育的发展,乃至社会的全面发展,则必须依靠改革。陈嘉庚说:“革命一事,殊未如此简单,工业需要革命,文化也需要革命”,“工业的革命,文化的革命,政治的革命,这是公的;心理的革命,人格的革命,这是私的。公的革命个人做不来,不能做,可以让别人去做,至于私的革命,如心理的革命,人格的革命,这些不能让别人去做,应该自己来做。”^{[8]102}这里,陈嘉庚所说的“革命”,意味着深刻的改革,他主张对包括工业、文化、政治等各方面进行改革,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因此,可以看到,在陈嘉庚看来,改革是

国家富强的发展动力。

实业发展国家实力,是国家富强的核心;教育提升民族素质,是国家富强的根本;改革促进社会进步,为国家富强提供动力。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陈嘉庚认为,以改革提供动力,发展教育,做强实业,确保国家富强,加之在文化向度上守护文化根脉,延续民族精神,民族复兴大业始能完成!

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复兴实践对陈嘉庚的思想感召及其行动汇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归结为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指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1]面对当时的旧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不如此,我们无以具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社会条件。联系到陈嘉庚的复兴愿望,同样,如果没有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的终结,没有一盘散沙局面的打破,陈嘉庚复兴思想中涉及的振兴实业、发展教育、立意改革、赓续文化命脉等理想根本无从谈起!

其实,民国以来,陈嘉庚个人倡导实业和教育兴国,呼吁革新,而且亲力亲为。他办实业、兴教育、倡改革、吁文化,奋力顽强,固然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就整体而言,陈嘉庚的个人努力并没有也无法改变旧中国的整体面貌。1923年,陈嘉庚说:“鄙人未研究商学,何敢言商,又非教育家,更何敢言学。惟内观国家过渡时代之艰危,外鉴列强文明事业之焕发,未尝不咨嗟太息,独怀生感,而弗能已于言者也。”^{[8]40}面对国内实业不振、教育不兴、政治落后的现实,陈

嘉庚还是咨嗟叹息,深知独靠一己之力难以实现理想。1927—1937年尽管被某些学者称为经济建设的“黄金十年”^[21],但实际上,国民党统治下的这10年其取得的成绩是非常有限的^①。1936年,陈嘉庚对中国实业发展就有这样的评论:“对于政界中人,如部长、厅长、师长,每言每日办公时刻多少,成绩如何,说得天花乱坠。可是,实际上,中国农村破产、经济破产,一些应做的重要工作,都未做到。轮船、飞机、汽车,不惟不能造,而且不能用,大逾千吨的轮船,已经无法开到南洋,飞机无论空军空邮,自己也都不能驾驶,动辄聘用外人。至如汽车,欧美竞赛,每小时开行二百余英里的,我们那个开得,这些这些,朝野上下,应该引为奇耻大辱,而后乃足以言改革。又如广东来说,粤汉路是中国交通上的脊骨,全线不过一千多里,满清时代,筑成甚多,所余也属无几,却是迁延至今,尚未造好。”^{[8]103}他比较当时成立才20年、但已经稳固整合社会的新兴国家——苏联,心生感叹,他说:“试看苏联,苏联从黑海到西伯利亚铁路,长七千余里,三年之间,居然完成,等到通车,才向世界宣布。”^{[8]103}对于教育,陈嘉庚也同样失望。1940年,他根据自己对福建的视察得出结论:“教育文化,如普通师范学校,全省仅设一所,学生八百名,不足一县之分配,其政策乖谬如此。”^{[8]157}至于国内无法取得长足进步的原因,在陈嘉庚看来,政治腐败是一大重要原因,“公务员营私舞弊,相习成风,了不愧畏,苛捐什税,指不胜数”^{[8]157}。

如果说,1937年以前,一盘散沙的社会状态和政治腐败还没有浇灭陈嘉庚以实业、教育以及社会革新为手段促进社会进步的信念,那么,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则完全打碎了陈嘉庚的梦想!正如陈嘉庚说:“寻常对外战争,战败亡国,今日若战败,则非只亡国,实将亡族。”^{[8]123}至此,对陈嘉庚来说,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希望首先在于创造两大前提,即第一个前提是抗日救亡,第二个前提是政治清明。诚如陈嘉庚自己所说:“今日凡我华侨之有树胶园者,

谁不欲其树胶之茂盛,收成之丰富,而对恶草白蚁,绝不留情,庶可达其愿望,祖国之抗战建国,何莫不然。本人亦希望祖国树胶(政治)之繁荣滋盛,故不能为恶草白蚁而留情,诸君爱国,必不后人,愿共勉之。”^{[8]179}这里,陈嘉庚一是强调“祖国之抗战建国”,二是又以“恶草白蚁”比喻政治腐败的毒瘤,认为抗战胜利后,国家发展必以“对恶草白蚁,绝不留情”。

谁能够担当抗日救亡和实现清明政治这两个重任呢?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一天开始,就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1937年5月,根据国共达成的国共合作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根据地改名为陕甘宁边区,9月6日成立边区政府。1940年3月底,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5月31日到6月7日,陈嘉庚展开了七天八夜的延安之行,短短的七天八夜给陈嘉庚带来强烈震撼,以致数年以后,陈嘉庚撰写《南侨回忆录》时依然心潮澎湃,还“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9]4}。在延安,他不仅深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的坚定决心,也充分目睹了边区政府建立的清明政治。面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陈嘉庚尤其被毛泽东朴素真诚、虚怀若谷的精神气质所打动。事实上,毛泽东洋溢出来的精神气质就是中国共产党精神品质的高度浓缩。延安之行,使陈嘉庚笃信,中国共产党是抗日的中坚力量,是充满人民情怀的廉能政治的建设者,真正与自己理念契合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延安的所见所感浇筑了陈嘉庚对中国共产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牢固信赖!1948年陈嘉庚说:“内战解决后,新中国政务之设施,福国利民,兴利除弊,当为蒋政府统治廿年所未有,近则闽粤江浙侨胞之桑梓,远则全国区域,势必日新月异。”^{[8]254}他还以苏联发展为例,称“比如苏联,内乱一平,在英明的领导者领导之下,经过十余年之经营,终于成为最强盛之国家。”^{[8]246}此语显示了陈嘉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心!

理念契合使得陈嘉庚和共产党站在一起,并

① 有学者就指出,所谓“黄金十年”的高经济增长,其实“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货币贬值造成的经济幻想而已。”参见:路瑞锁.都是货币惹的祸:透过金钱看历史[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2:294.

认同中国共产党, 不仅如此, 陈嘉庚在行动上也汇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复兴实践。1949年5月, 陈嘉庚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 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 共商国是, 并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常委, 陈嘉庚以华侨首席代表名义致词, 表达了广大海外华侨心向祖国, 决心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的殷切心情; 同时积极提出建设性的提案7项。1950年, 他为了新中国的繁荣富强, 毅然放弃了优裕的物质生活, 回国定居。此后, 陈嘉庚担任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等职务。在回国期间, 他前往全国等地参观、视察, 对祖国的新生、民族的复兴, 他充满了信心。在自己的分工领域, 他贯彻党的方针政策, 团结广大爱国华侨, 为祖国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曾以坚定明确的态度说: “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做我们前人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已经取得重大的成就。事实证明,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国家富强, 使人民幸福。”^[22]

三、陈嘉庚民族复兴意识和实践路径转变的当下启示

延安之行前, 现实中的政治腐败和外患使陈嘉庚先生不断受挫, 希望落空; 延安之行后, 陈嘉庚转变思想, 将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 和中国共产党坚定站在一起,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与中国人民一道推进民族的伟大复兴。陈嘉庚民族复兴探索中的这一转变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一)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是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中国人奋力以改良和革命的手段让中国人摆脱屈辱、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抗战之前, 陈嘉庚以实业发展国家实力, 以教育提升民族素质, 以改革促进社会进步, 以文化确保民族精神, 思想恢弘, 立意高远。陈嘉庚这些思想彰显他挚爱国家和民族的拳拳之心, 但总体上其思想脉络仍然属于当时的改良思潮, 在没有改变社会结构的大前提下, 陈嘉庚的努力

是无法达到预期目标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 就坚持不懈地探索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和方法, 通过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分析, 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 由此提出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路径。作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矛盾, 领导解放战争, 解决了阶级矛盾, 最终使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政治前提, 没有民族的独立, 没有政治的民主, 民族复兴的一切努力都无从谈起。对此, 陈嘉庚从个人经历和思考中, 已经有了深切的认识, 如前所述, 陈嘉庚1948年欣喜地说过: “内战解决后, 新中国政务之设施, 福国利民, 兴利除弊……, 势必日新月异。”^{[8]254} 因此, 在解放战争中, 他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中, 陈嘉庚更加清楚在旧中国徒靠教育、实业等无法救国, 救国和民族复兴一样, 都需要有可信赖的领导核心, 需要有这个领导核心动员出强大的政治力量, 否则无法取得抗战的胜利, 也无法实现清明政治, 最终无法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因此, 在陈嘉庚看来, 唯有中国共产党找到中华民族的道路和方法,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 他在《伟大祖国的伟大建设》一文中直言: “我的总观感是, 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做我们前人从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事实证明: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国家富强, 使人民幸福。社会主义是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23]

今天, 中华民族的复兴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 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所在。在以往, 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长期占据着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发展到21世纪, 在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凸显和国家间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下, 西方模式已暴露出不可调和的弊端。此种情形下,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应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新征程中, 我们唯有坚持党的领导, 才能够最大程度克服现代化过程中资本发展和市场

盲目竞争带来的无序性,克服政党轮流执政下的互相掣肘、倾轧以及效率低下的弊端,保证国家大政方针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发挥全国一盘棋的战略统筹优势,从而目标坚定地实现我们的百年目标,确保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 必须团结最广大的人民,共绘民族复兴蓝图

陈嘉庚并不是一开始就认同中国共产党的,一直到1940年,赴延安之前,他对国民党恶意污蔑共产党的说辞都依然“亦是疑信兼半”^{[8]184},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充满人民情怀,坚守正道、坚持抗战,建立廉能政治,最终赢得了延安之行后的陈嘉庚的认可,至此,陈嘉庚也将中国民族复兴的愿望完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说:“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1]当年,陈嘉庚被中国共产党所感召,汇入到中国共产党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陈嘉庚极大地影响到广大海外华侨的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就有许多学有所成的华侨放弃在国外的优渥生活,回国参加国家建设。据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5年内,回到祖国参加建设的华侨就有18万。其中1949年9月到1952年底,学成回国的留学生达到2400人,占当时在国外留学生总数的一半。建国初期,归国华侨日益增多,到1955年底约有21万华侨回到国内^[24]。他们毅然回归祖国,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这些归国华侨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建设的支持又形成了一个历史高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称赞的:“我们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建设事业同大批心系桑梓、心系祖国的华侨是分不开的。”^[25]总之,正是因为有陈嘉庚先生为代表的华侨华人的杰出贡献,才有我们事业的勃勃生机。同样,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

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1-07-02(2).
- [2] 习近平总书记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回信[N]. 福建日报, 2014-10-22(1).
- [3] 杨进发. 战前的陈嘉庚史料与分析[M]. 新加坡: 新加坡南洋学会, 1980: 3.
- [4] 王增炳, 陈毅明, 林鹤龄, 编. 陈嘉庚教育文集[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9.
- [5] 李书城. 论中国商业不发达之原因[G]//张枬, 王忍之, 编.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 第1卷·上册.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0: 471.
- [6] 郑观应. 盛世危言[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6.
- [7] 陈达. 浪迹十年[M]. 上海: 商务出版社, 1946: 470.
- [8] 陈嘉庚. 陈嘉庚言论集[M]. 厦门: 中国厦门集美陈嘉庚研究会, 2004.
- [9] 陈嘉庚. 南侨回忆录[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4.
- [10] 郑振铎, 编. 晚清文选: 第3册[M].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03: 520.
- [11] 中国史学会, 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 第4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3: 9.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 毛泽东早期文稿[M]. 长沙: 湖南出版社, 2008: 669.
- [1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609.
- [14] 龚自珍. 龚自珍全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6.
- [15] 汤志钧, 编. 康有为政论集: 上册[G].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256.
- [16] 汤志钧, 编. 康有为政论集: 下册[G].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797.

- [17] 汤志钧, 编. 章太炎政论选集: 上 [G].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272.
- [18] 许守微. 论国粹无阻于欧化 [G] // 张枬, 王忍之.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 第2卷·上册.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0: 52.
- [19] 王新命. 我们的总答复 [J]. 文化建设, 1935, 1 (8): 372-376.
- [20] 王新命.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J]. 文化建设, 1935, 1 (4): 9-16.
- [21] 秦孝仪. 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 [M]. 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3: 2.
- [22] 陈嘉庚. 新中国观感集 [M]. 厦门: 中国厦门集美陈嘉庚研究会, 2004: 25.
- [23] 朱立文, 编. 陈嘉庚言论新集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 138.
- [24] 石汉荣. 探解中国侨务 [M]. 香港: 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 2004: 254-255.
- [25] 楠娅. 继续凝聚更多“侨”力量 [N]. 人民日报, 2020-10-25 (6).

Tan Kah – kee’s Awareness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me of CPC One – hundred – year Endeavor

XIAO Shi – ping^{1,2,3}, ZHOU Yu¹

(1. School of Marxism,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of Tan Kah – kee and Patriotism,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3. Tan Kah – kee Research Institut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an Kah – kee longed for national rejuvenation. Before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he advocated improving national quality through education, developing national strength through industry, promoting social progress through reform, and ensuring national spirit through culture. Tan Kah – kee practiced this with difficulty, but finally realized that relying on his own power was ineffective, and Japan’s full – scal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in 1937 shattered his dream of revival. At this point, Tan Kah – kee realized that there were two major prerequisites for national rejuvenation: resisting Japan and saving the nation, and political clarity. Since 1921,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unhesitatingly shouldered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trip to Yan’an in 1940 showed Tan Kah – kee the solid power to resolve the two preconditions. As a result,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practi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formed a strong ideological inspiration for Tan Kah – kee and his firm action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an Kah – kee started a new practic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actice path of Tan Kah – kee’s national rejuvenation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for the present.

Key words: national rejuvenation; TanKah – ke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责任编辑 冯庆福)